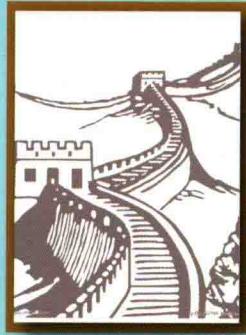


文明与秩序的回归：

WENMING YU ZHIXU DE HUIGUI

社会诚信建设研究

臧乃康 张扬金 韩裕庆 林莉 著



 人民出版社

文明与秩序的回归： 社会诚信建设研究

WENMING YU
ZHIXU DE HUIGUI

臧乃康 张扬金 韩裕庆 林莉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姜冬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与秩序的回归：社会诚信建设研究 / 藏乃康等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1

ISBN 978 - 7 - 01 - 017068 - 8

I. ①文… II. ①藏… III. ①社会公德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 D64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9136 号

文明与秩序的回归：社会诚信建设研究

WENMING YU ZHIXU DE HUIGUI SHEHUI CHENGXIN JIANSHE YANJIU

藏乃康 张扬金 韩裕庆 林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2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068 - 8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南通大学人文社科精品著作工程重点资助

序

文明与秩序是特定文化孕育出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自觉构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明禀赋和价值诉求，构筑了传统社会的文明与秩序。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扩张，使得中国传统文明与秩序渐进解构。实现中国传统文明与秩序的现代转型，重构中国现代文明与秩序已然成为时代的必需。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转向对文明的认同和忠诚，并且这种转换正在产生一种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秩序。不言而喻，文明、秩序、诚信之间是不可分割的，臧乃康教授与其团队成员所撰写的专著，将其书名标定为“文明与秩序的回归：社会诚信建设研究”是有其道理的。

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又是人集合的社会。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静止状态，而是时刻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人因社会变化而变化，社会又因人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历时态角度看，这种相互的动态变化表现为上升的、发展的文明与秩序的过程；从现时态角度看，这种相互的动态变化又表现为互嵌、互构的反应过程。在人与社会相互的动态变化中，诚信是最基本的根基，既是前提，又是结果。诚信是人和社会存在的前提，没有诚信，就没有社会中的人，同样也就没有人集合的社会。诚信又是人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没有人和社会的相互动态关系，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诚信。因此，诚信不仅仅只是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是人和社会需要追求的最高价值追求。同时，诚信还是形而中、形而下的具体概念，总是与一定社会形势背景相对应，有什么样的人和社会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诚信。从形而中意义上，诚信指向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人和社会必须遵守的伦理规范；从形而下意义

上，诚信指向一定社会背景下人和社会对于诚信兑诺的各种行为。社会诚信既是文明的呈现，也是秩序的意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美国史蒂芬·M.R. 柯维、丽贝卡·R. 梅里尔在《信任的速度》一书中说，“世界上，每一个个人、团队、家庭、组织、国家、经济和文明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最强大的政府，最成功的企业，最繁荣的经济，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最伟大的友谊，最坚强的个性，最深的爱，统统都会被摧毁。……这个力量就是信任。”

诚信广泛涉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国家与国家、国家与社会等多个层面，对于人和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人之为人”“组织为之组织”“国家为之国家”“社会为之社会”的基本原则。中外古今，诚信一直都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先哲们对于诚信的解读更注重价值层面。《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讲的就是“天之道”与“人之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是将诚信与物质、身体和精神紧密联系，以善作为至上价值。传统时代对于诚信内涵的解读，中西方因社会情境不同差异较大。中国古代强调“熟人诚信”，认为诚信是建立在个人人格基础之上的熟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仅被限制在“五伦”之间的私人关系领域。西方社会强调“契约诚信”，认为诚信是陌生人之间的商事行为准则，诚信边界扩展到所有的业缘关系领域。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中外先贤们的诚信解读为我们提供了基础和参照，但对于诚信的理解不能仅满足于先人的思想传承，更需要立足现实情境去考量、去创新。

岁月的车轮总是无休止地向前碾压，而人类也在这一过程中收获了文明，同时也生成了秩序。纵览当今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达到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在人类社会状态方面也因此发生大的震动，过往时代的诸多社会表征被逐渐剥离和撕裂，并呈现出两大典型特征：一是得益于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达，人类社会正逐渐由现代化、工业化向后现代、后工业化社会迈进。二是得益于生产力发达和人们全球意识的浓厚，全球化正逐渐由经济全球化向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层面纵深推进。毋庸置疑，这些社会变动有大的正向意义，它会带给人类更多的物质、

更多的享受。然而,也同时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意义,会带给人类新的困境、新的遭遇,特别对人和社会赖以存在的“诚信”是极大挑战,这需要给予理性和及时的回应。首先,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更加频繁,诚信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代更为迫切,国家、国际组织、企业之间的交往必须是平等的、自由的、公正的和充分信任的,而这与殖民时代的国际社会旧秩序不相兼容,这在理论上迫切需要新的国际诚信新秩序的回应。其次,利益至上、道德滑坡是文明、秩序沦陷的前兆。启蒙运动开辟了人的自由、新生的时代,带人类走进了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但理性主义在破除愚昧主义的同时,也无意中削去了人的道德禀赋。在理性主义理念支配下,诚信对于人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的利益,而没有了道德敬畏,追求自利的人们不诚信行为也就越发增多,社会也就迈入了名副其实的风险时代。

现实问题需要有理论观照。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深刻转型期,体制机制的转换转轨、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度调整,给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造成了深刻影响。个体诚信意识薄弱、治理诚信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公信力流失,构建一个运行有序的现代文明社会,社会诚信是不可或缺的灵魂和路向标定。臧乃康教授领衔撰写的专著《文明与秩序的回归:社会诚信建设研究》立足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从诚信缺失问题出发,全方位诠释了现代社会诚信的类型、价值、问题与应对等多方面,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学理性的工作。该书特点有:一是内容框架的科学性与完整性。本书结合中国现实情境,将社会诚信区分为政府诚信、市场诚信、公民诚信、司法诚信、媒体诚信,五种诚信类型在社会中各具角色,相互配合,共同构筑成社会诚信大系统。通观内容,第一章和第二章从宏观角度解读了社会诚信的历史渊源、基本特征、伦理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三章到第七章则是从微观角度解读了五种不同诚信类型的价值、现实缺失、问题检视、路径选择等问题。最后第八章则是基于以上研究,以全球化视野高度解读了国际诚信秩序重构、中国诚信秩序策略选择等方面的问题。这种内容安排,既体现内容框架设计的科学性与完整性,同时又体现强烈的现实情怀和人文关怀。二是技术路径的可行性与新颖性。该书作者并不是简

单的就事论事，也不是先贤诚信思想的简单“传教”，而是采取事实与价值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事实与价值相统一，既有现实问题的解剖，又有学理上的价值追溯，能使诚信问题研究相得益彰。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既有纵切面的路径依赖分析，也有横切面的综合因素演绎，能使诚信问题研究透明透彻。本书所探讨的社会诚信建设，不是追逐时代热点的附和之作，而是希望通过社会诚信建设的探讨，为社会转型期的秩序重构和文明回归提供一种理路。

总之，对于个人、国家、组织和社会而言，诚信都是现代社会基本的“底线道德”。对个体而言，社会诚信是立人之本；对于社会而言，社会诚信是善治之源；对于国家而言，社会诚信是立政之道；对于世界而言，社会诚信具有被广泛认同的价值。任何社会主体要迈向现代化的未来都必须获得“诚信”这个通行证。该书个中概念或许有待商榷、有待深入，但它体现出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却是事实存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诚信建设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这有理由引起我们的热切关注。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浅见，该书真正意义和价值到底如何，还有待各位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给予评鉴！

是为序。

包心鉴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社会诚信：历史审视与现实缘由 / 1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诚信 / 2
- 第二节 西方传统的社会诚信思想 / 6
- 第三节 社会诚信的类型解析 / 9
- 第四节 社会诚信的特征及其作用 / 19
- 第五节 转型社会中的社会诚信省察 / 25

第二章 社会诚信：基本框架与现代重构 / 32

- 第一节 社会诚信的多重价值 / 32
- 第二节 社会诚信的传统内涵 / 41
- 第三节 社会诚信的现代重构 / 50

第三章 政府诚信：社会诚信的引领 / 62

- 第一节 政府诚信的多视角考量 / 62
- 第二节 政府诚信建设的现实困境 / 73
- 第三节 政府诚信建设的价值定位 / 78
- 第四节 政府诚信建设的中国选择 / 83

第四章 市场诚信：社会诚信的基石 / 94

- 第一节 市场的发展源流与市场诚信释义 / 94
- 第二节 市场诚信缺失及其原因考察 / 103
- 第三节 市场诚信建设的价值厘定 / 109
- 第四节 市场诚信建设的应对理路 / 112

第五章 公民诚信：社会诚信的主体 / 120

- 第一节 公民诚信概念阐释 / 120
- 第二节 公民诚信建设的现实挑战 / 129
- 第三节 公民诚信建设的价值维度 / 136
- 第四节 公民诚信建设的路径选择 / 140

第六章 媒体诚信：社会诚信的工具 / 145

- 第一节 媒体诚信及其社会价值 / 145
- 第二节 媒体诚信缺失的呈现及其检视 / 155
- 第三节 加强媒体诚信建设的策略选择 / 164

第七章 司法诚信：社会诚信的保障 / 172

- 第一节 司法诚信范畴的意蕴 / 172
- 第二节 司法诚信离散的缘由解析 / 184
- 第三节 司法诚信建设的推进路径 / 191

第八章 全球化背景下诚信秩序重建 / 199

- 第一节 全球化与诚信秩序概念厘定 / 199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诚信秩序现状审视 / 205
-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诚信秩序的重构 / 211
- 第四节 全球化背景下诚信秩序的中国应对 / 218

主要参考文献 / 228

后记 / 232

第一章 社会诚信：历史审视与现实缘由

党的十八大要求全党同志，清醒看到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中“诚信”用了6次，与诚信相关或相近概念的使用，“真诚”1次、“求真务实”2次、“信任”2次、“互信”4次，这是历次党代表大会前所未有的，表明了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高度重视。

社会诚信是整个社会形成的一种诚实守信的价值观、道德评价、行为规范、制度安排、社会风尚。这既是公民道德的基石，又是每个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同时呈现为一种经济伦理、社会伦理。“世界上，每一个个人、团队、家庭、组织、国家、经济和文明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最强大的政府，最成功的企业，最繁荣的经济，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最伟大的友谊，最坚强的个性，最深的爱，统统都会被摧毁。相反，如果这个力量被很好地培育和运用，它可以为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对这个力量知之甚少，总是忽视它的存在，低估它的潜能。这个力量就是信任。”^① 在公民中普遍培育诚信意识，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安定有序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诚信既是调节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一种道德准则，也是市场主体所应遵循的一种经济伦理操守；还是一种政府行为规范，表现为政府对公众在委托契约中赋予的期待和信任的责任感及其回应。

^① [美]史蒂芬·M.R.柯维：《信任的速度：一个可以改变一切的力量》，王新鸿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诚信

儒家的诚信思想对于中华民族诚信文化性质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定位和规范作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重点在儒家的诚信思想。儒家讲“诚中形外”“德不可掩”。其言道德，所重在人己、物我、内外的一体贯通。

一、诚信的语义解读

在古代，“诚信”两字字义相近，但是也有明显的差别。“诚”与“信”都强调真，“诚”偏重于内心，主要指向在本体；“信”侧重于外，主要指向他人。儒家的早期著作中，“诚”多与“真”“实”等概念相关联，“信”多与“忠”“任”等概念相关联。《中庸》中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①“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②这里所说的“诚”，主要是天道之诚，是指天地自然、人间万物的内在规律及其本性。“诚者”是指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属性的人。“天道”与“人诚”之间具有相通之处和内在统一性。

《孟子》中说：“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诚其身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③孟子所讲的“诚”，是指为人诚实和真诚，强调人的本质应该效法天道客观真实的品德。显然，孟子对“诚”的理解和解析，与孔子“诚”的思想是极其相近的。

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④即强调一个人信用的重要性。信于

① 《大学·中庸》，王国轩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1页。

② 《大学·中庸》，王国轩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2页。

③ 《孟子正义》，焦循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08—509页。

④ 《论语集释·学而下》，程树德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9页。

言，意思是人要忠实于自己的言行，信与行是依于言，说到做到，说了就要做。要求人要重言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①指的就是要言于信，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准则。孔子因而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规范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信”与“仁”“义”“礼”“智”一起，作为“五常”，成为中国古人五种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二、不同语境下的社会诚信

1. 诚信：立身之本

按传统道德的考量，人与人之间需要真诚相待，才能建立起良好人际关系。真出自本心，诚忠于本质，真诚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既不坑蒙拐骗，也不自欺欺人，要讲求信义，这样才能言可复，行可行，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从而保证其言行的真实性、持久性、可靠性。

传统文化中把诚信看作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孔子说，“大车无輗，小车无軎，其何以行之哉？”^②孔子用车子和輗軎作比喻，说明诚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赖以生存、安身立命的道德起点。儒家认为，诚信是处世为人的道德底线和基准，否则就如同车子缺少輗軎这类枢纽就不可能行进一样。人如果缺少诚信品德，同样寸步难行。

诚信是人际交往的工具。在儒家看来，要讲诚信，首先必须具备忠诚老实的道德品质。诚是信的前提，信是诚的结果，两者不可分离。你诚信，别人会信任你；你不诚信，别人就不会信任你。“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③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老实忠诚、敦厚谨敬，即使身处落后的部落也会畅行；反之，如果失去诚信，即使在本乡本土也会举步维艰。

诚信是君子的为人之道。圣人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一般的人难以

^① 《论语集释·为政下》，程树德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6页。

^② 《论语集释·为政下》，程树德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6页。

^③ 《论语集释·卫灵公上》，程树德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65页。

修炼成这种最高境界；君子也是一种理想人格，堪称道德楷模，人们能够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这一境界。怎样才能变成“君子”呢？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①首先要具备诚信的品德，然后才能成为君子。要有讲诚信的为人之道，君子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把“讲诚信”作为重要的基本准则。

2. 诚信：治国之策

《吕氏春秋》在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对治国意义的诚信进行了论述，“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②社会结构、秩序、行为规范应该具有稳定性，人的行为必须善始善终，都要讲求信义。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治国不取信于民，就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取信于民是治国的基本要求，“宽则得众，信则民任”^③。子思在《中庸》中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④这里所讲的就是诚信在治国安民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提出“为政以德”^⑤的主张，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诚信是“为政以德”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为政以德”首先讲诚信。儒家认为，为政者必须有诚信品德，这是为政者的底限。因此，为政者的诚信程度，事关社会治乱、国家兴衰。孔子说为政者要“敬事而信”^⑥，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为政者要诚实无欺，讲究信用，绝对不能失信于民。只有讲诚信，才能取信

^① 《论语集释·卫灵公下》，程树德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00页。

^② 《吕氏春秋》，王启才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页。

^③ 《论语集释·阳货上》，程树德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99页。

^④ 《大学·中庸》，王国轩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0—101页。

^⑤ 《论语集释·为政上》，程树德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1页。

^⑥ 《论语集释·学而上》，程树德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页。

于民，受老百姓的拥护和信赖。古今中外的历史，无不证明：凡是取信于民者，就能天下大治；凡是失信于民者，就会天下大乱。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孔子揭示了取信于民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① 在孔子看来，虽然军备、粮食和民众的信任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条件，但民众的信任更为关键，“信”比“兵”“食”还重要。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才能治理好国家；否则，失信于民，就必然造成天下大乱。

孔子认为，为政者应作出表率，促进全社会讲诚信风气的形成。“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② 这里，揭示了民风同官风之间的关系。儒家一贯重视为政者在道德行为上的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 这就是说，为政者能否做到以身作则、忠诚老实，不仅是道德品质问题，也是行政绩效的问题。为政者讲诚信，以身作则，下属乃至百姓都会效仿，形成人人讲诚信的社会风气。

3. 诚信：交易之则

诚信是中国儒商在经济交往和市场活动中追求的人格境界。中国传统诚信无欺的商业道德把“信”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前提。“人无信不立”成为商业活动的基本规则。

第一，守信。儒家认为“言必信，行必果”^④。意思是说，说到一定做到，要做就要坚持到底。这样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维护和扩大自己的信誉。“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⑤。也就是说，真情就是精诚到了极点。如果做不到精诚，就不能感动别人。市场活动中，必须以诚信为宗旨，

^① 《论语集释·颜渊上》，程树德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36—837页。

^② 《论语集释·子路上》，程树德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97页。

^③ 《论语集释·子路上》，程树德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01页。

^④ 《论语集释·子路下》，程树德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27页。

^⑤ 张松辉：《庄子译注与解析（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36页。

坚守诚信，不失信、不失约。

第二，重义。诚信要求在人际交往和市场交易中不仅要践信于约，更要取信于义。中国传统文化中，义是诚信的依据和标准。孟子要求人们的行为“唯义是从”，认为“信”和“果”都必须以“义”为要，“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①义是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和行为准则。

第三，公平。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倡导市场活动中公平交易、忠实不欺。“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②就是说，如果布帛的缕数达不到精布、细布、粗布的要求，其宽窄不符合规定，就不能拿到市场去卖。买卖公平要不欺心，有不欺人之心，才会无欺人之举。

第二节 西方传统的社会诚信思想

在西方国家，社会诚信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与长期的思想文化积淀有着密切的关联。西方社会经济伦理表明，在生产伦理上，主张创新、契约、法制，反对破坏生态，尊崇自然；在分配伦理上，强调公正、公平、正义，以协调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在交换伦理上，强调诚实、守信，以维护规范的市场秩序；在消费伦理上，强调整俭，抑制奢侈、浪费。西方的诚信观，不仅起到了协调人际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经济主体会产生内在的约束作用，对建立协调规范的市场秩序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强调财富的获得要符合德性

古希腊罗马人认为适度是德性的特征。从节制角度看，拥有中等财富是最理想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的构成要素可以归为三类：外物

^① 《孟子正义》，焦循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55页。

^② 王文锦：《礼记释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4页。

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①，优良的生活包括财富、身体和德性。他认定，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定，对德性的追求却多多益善。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德性高于财富，德性统率财富，“灵魂这种东西，假如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能达到的境界上，比我们所拥有的财产或者是我们的躯体更为珍贵的话，那么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裕的财产或者是健康的躯体更为可贵。我们还应该知道一点，其他这一些事物（包括财产、躯体健康）自然是为了灵魂的缘故才为人们所选取的，同样地每一个具有良好的实践智慧的人也必须如此选择，而不是为了这些事物才选取灵魂的”。^②

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是离最好的政体形式最接近的形式自然就会比其他任何形式好，而离中庸之道（也就是离最好的政体形式）最远的政体形式必定是最坏的形式”。^③他认为，由中产阶层构成并由其执政的城邦必定能得到最好的治理。因为中等收入阶层执政的政体，一是可以调节善恶力量的对比。在一个城邦中，拥有中等财富的中间阶层是最优越的，最安分守己、理性；而处于极端境况的人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容易趋向邪恶。二是中等收入阶层通过参加权力角逐，可以改变各派力量的对比，从而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并且，很多优秀的立法者均来自中等收入阶层。^④

二、崇尚和赞美诚实劳动

古希腊罗马人认为，只有辛勤的劳动才能致富，而且认为劳动是神明所赋予的使命。他们所重视的劳动主要是农业劳动，认为农业是至尊的事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高书文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页。

^②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高书文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页。

^③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高书文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页。

^④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高书文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185页。